

新观察

作为一种文化症候的“地方”

——“新南方写作”的四个问题、四种可能

□李浴洋

对于“新南方写作”，学界已经热议有年。一批可以被置于“新南方”谱系中的作品近来密集问世，更使得这一话题成为文坛焦点。“新南方写作”虽然是一个主要建立在当下活跃的文坛现场与书写实践基础上的概念，但由此连带生成的新的汉语/华语文学观念，尤其是更具开放性与多元化的文学史视野，以及背后某种具有历史哲学意味的思考，对于看待和阐释晚清以来百余年间中国现代文学都是有效且充满启示的。在这种意义上，关于“新南方”的讨论实则提供了一个重新检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可能性的契机——前者指向对于历史的理解与发现，后者关乎汉语/汉语书写的前景与生路。而两者又是彼此交织、相互缠绕的。所以，“新南方”的视野不仅与当代文学的写作与研究相关，也值得邻近学科关注。当然，反之同样成立：百余年来文学史、学术史与思想史也可以为“新南方”提供经验与提出问题。重头之一，便是倘若不满足于仅将“新南方”作为一种描述性的地域文化/文化概念的话，其间内在的跨界性应当成为未来思考与讨论的主要方向。

“新南方”与“南洋”

我曾在《文学史家视野中的“地方”》一文中提到过，在乡土意识与人伦观念十分浓厚的中国，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从来都不外在于文人学者的视野。但这是就具体经验而言的。在宏观层面上，“地方”成为全局性的知识、方法与情怀，则不是文学史与学术史上的“常态”。因为在很多时候，关怀故乡或者书写乡邦更多只是个体趣味。至于“地方”何时“浮出地表”的话题，其实有赖诸多主客观条件的支撑，绝非“自然而然”。有识之士的引领与接受水平的成全或许是关键，而历史境遇与文化潮流形塑的问题意识与思想观念则是前提。所以，“地方”何时以及因何、如何成为“显学”不仅是某一时期文学与学术进程的表征，也是此一时代的见证。“地方”的升降浮沉，本身就是一种症候，构成了认识与理解时代精神、情感结构与文化脉络的入口。“新南方”被看到与提出，也当作如是观。

通常认为，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出版，标志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地方”视野的崛起。而在当代文坛上，“地方”写作也在90年代开始蔚为大观。不过饶有意味的是，在严先生主编的丛书中，并没有对应“新南方”覆盖区域的一卷。在各地竞相崭露头角之际，这一地带却不见踪影。直到近年，“新南方”概念及其指称的文学实践才后来居上，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造成由隐到显的动力、触媒与情势自然不能够略过。

无独有偶，晚近不但大陆批评家与作家在纵论“新南方”，台湾与海外学界也瞩目“南洋”议题。王德威提出“华语南洋”的概念，并且由此辐射开去，主张“南洋”是华语世界，也是非华语的世界；是“人间”的世界，也是风与土、山与海的世界。如果以此参照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诸种论述，可以发现“南洋(文学)”与“新南方写作”有“同”也有“异”。而经由《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王德威事实上也参与到了“新南方”的讨论中。“新南方”的现实魅力与理论潜力，由是可见一斑。但仍有必要承认，“南洋”与“新南方”是两种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视野。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两者的对话关系，以及不同的资源、脉络与话语在“南方”这一课题上的联动与竞争？其间的合力与张力，或许是未来的讨论可以更进一步展开的话题。而在此背后，更大的问题意识还包括海内外为何不约而同在此时此刻选择朝向“南方”发力。

“地方性”内外

我在构思前述《文学史家视野中的“地方”》一文时，遇到一个问题，便是都市研究是否也属于地方研究。比如，同样以上海为对象，当我们使用“海派文学”的概念时，无疑内置了地方性的角度。但说到“上海摩登”时，地

“地方”何时以及因何、如何成为“显学”不仅是某一时期文学与学术进程的表征，也是此一时代的见证。“地方”的升降浮沉，本身就是一种症候，构成了认识与理解时代精神、情感结构与文化脉络的入口。

在以“海洋”与“陆地”作为分野的地理基础上，“新南方”还可以提供哪些新的尺度与想象？

方性的层面则又被以都市文化为核心意涵的现代性所压抑。香港也是如此。一方面，它的确是文学地理版图中的“地方”之一——譬如陈国球的《香港的抒情史》揭示的那样；可另一方面，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又不会把香港作为一种“地方”景观来看待，更不用说将其城与人的特征定义为某种“地方性”了。

但我们真正以“地方”来命名某种文学传统与文学实践时，又应当如何处理其中的“地方性”问题呢？在我的理解中，“新南方写作”之所以“新”，除去与(旧)南方区隔以外，还旨在超越“南方”的界限。但这种超越又必须是通过书写“南方”来实现的。这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挑战，也对于创作和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南方性”的文学当然不是“新南方文学”，但其间的“南方性”又需要具有内向突破甚至自我超克的追求，否则大概也不具备“新南方”之为“新”的意涵。换言之，“新南方写作”必须能够在“地方性”内外自由穿梭。

“新南方”与“南方”，“南方”与“北方”，总是相对存在的概念。何者为“南”，何处是“北”，从来都不绝对。立说者的位置、感觉与意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主导性的。这样一来，当“新南方”将“南方”/“北方”相对化时，其本身也被相对化了。所以，在这种意义上，“南方性”的意涵还需要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被赋予，而不仅是作为一种相对的参照，或者他者化的景观。

挑战还在更大的文学版图中展开：“新南方”之于整个汉语/华语文学而言，首先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坐标，但在此基础上，它又能提供哪些既与这一坐标相互关联，同时又不为定型与惯性的“南方”符码与想象回收的经验呢？这恐怕将是“新南方”自我建设的关键。否则，“新南方”大概难免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旧)南方”。

跨学科与跨媒介

“新南方”不仅是一个文学概念，它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与跨媒介的存在。就在“新南方写作：地域、文化与想象”会议举行的同一个周末，由北京中间美术馆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我们共享的河流：从澜沧江到湄公河”特展在北京开幕，“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人类学家刘志伟担任学术顾问的纪录片《乡村中的知识分子》也在北京大地上映。前者凸显中国与东南亚对于“河流”的共享及其即时、即地的“在地性”艺术呈现，大自然是来自不同国别艺术家们致意的对象；而后者关注珠三角“田野”中文化传统的存续问题，乡村知识分子是片中表现的主角，也是天然的“讲故事的人”。两者贯穿的理念其实与“新南方”的关怀多有契合，这提示了不同学科与媒介进行对话的可能与必要。

当我们讨论与“南方”有关的诸多概念时，可以关联的知识背景与思想网络很多——比如谈“华南”，离不开

人类学与民俗学的支撑；谈“岭南”，则有艺术史与文化史的前提；谈“南洋”，需要考虑移民史与华人史的问题；更不用说讨论“海洋”与“岛屿”，还得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而“风土论”与“人文地理学”构成了所有这些言说的共同基础，想象力则是贯穿其间的不可或缺的纽带。这启示我们，对于“新南方”应当在一种跨界多元的网络中加以看待。

“西南”之于“新南方”

广东、海南、福建皆有参与“新南方写作”甚力的作家与批评家，而广西的《南方文坛》杂志在整场讨论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这里有必要带出一个问题：广西——而非东南——讨论“新南方”究竟意味着什么。

杨庆祥在界定“新南方”时专门提到了“海洋性”。而循此列出的能够被“新南方”范畴辐射的区域包括：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与泰国等。近年被作为“新南方写作”代表的作家，大都出自两广与海南。如果在广东或者海南讨论“新南方”，大概不需要多做辨析。但在广西却不一样，因为它一方面联系“海洋”，另一方面也同时关涉“西南”。

在中华文化版图中，“西南”是与“东南”不同的区域。但两者同属“南方”则无疑。不说作为地理、政治、文化区域的“西南”的核心地带成渝，单说贵州。因为某种机缘，我个人有机会较多阅读了贵州安顺的若干文本，也了解到这里和被“新南方”包纳的地域一样具有“丰富多元的文化遗存与文化族群”。江南文化西迁，在此落地生根，杂糅形成了“屯堡文化”；而作为交通要道，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在此汇通；同样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不同，安顺也形成了异质性与多元化的文学力量，充满“山野精灵”(钱理群先生语)。而安顺所在的黔东南，就在贵州与广西最相邻的地方。在广西讨论“新南方”，除去视野向东向南，一界之隔的安顺——西南是否也值得考量？还是说就以是否“与海洋接壤”一刀切？这背后除了涉及区划问题，还关乎究竟怎样理解“南方”之“南”。更进一步追问，在以“海洋”与“陆地”作为分野的地理基础之上，“新南方”还可以提供哪些新的尺度与想象？提出“西南”之于“新南方”的意义，并非意在让后者无限扩大，而是希望推敲一个更为实在与内在的回答。

从“地域”出发——笔谈(一)

工作人员要往佛香阁上搬蜂窝煤、搬门票，毕竟这里冬天天西北风吹得正紧，还要为了保护古建而不安取暖设备。也许只是冥冥注定，佛香阁舍不得作者走，相看两不厌，唯有颐和园。她与同事们在忙碌一天之后，可以一起回眸看一会儿旧日的斜阳。

以往读颐和园的文章，喜欢王国维的《颐和园词》：“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忆昔先皇幸朔方，属车恩幸故难量……”可比肩《琵琶行》与《连昌宫词》，如有清一代之兴亡史，充满了士大夫的慷慨悲歌。而杜梨的散文里，却是一种久违的自如。她写作不较劲，浑然天成。因为她对人、动植物、阳光雨露都充满了孩子般的好奇心。

古籍建筑，皆逸趣横生；神佛雕像，都自带萌色。正如作者在文中的一段话：

我一直觉得，古建上最迷人的部分，不是那些精致的雕绘和五色的油彩，无论是旋子彩画，苏式彩画还是和玺彩画，都不及瓦檐上长出的野草，牌匾后的蝙蝠和筒瓦里的雨燕，后者才是古建活着的、呼吸的部分。我理想中的散文，应该是这样的味道。

文学名刊 主编谈

“ChatGPT 出来之后，对我们文学期刊的逼迫和挑战应该是很大的。几乎可以预见，在5年或者10年之内，文学写作的相当部分会被替代，不会被替代的自然那些特别有创造力的作品。”

江南

《江南》杂志是浙江省唯一的省级文学刊物，被称为浙江文学的一张重要名片。这些年里，我们一方面努力保持江南刊物的应有特色，另一方面积极求变，不断获得新的进步。

刊物的特色首先从封面开始。近些年，我们特邀中国美术学院设计系的数位教授先后设计刊物封面。这些封面有着不同的气质，但均是江南元素醒目、画面风格鲜明，并注重当代气息的加入，表达了《江南》杂志追求优质文学之理念。把这样的封面放在一堆杂志里，相信是能掠夺目光的。事实上，这些年《江南》杂志的清新脸面，不仅赢得了读者的肯定，也收获了“中国最美期刊”称号。当然，读者的审美也是不断演变的。今后几年，我们会在延续原有风格的同时，增添当下的新颖元素，使我们杂志的封面始终具备“文学、江南、思想、前卫”的特点。

面子重要，里子更重要。近些年，我们使劲抓住郁达夫小说奖来强化杂志的特色。郁达夫小说奖是

《江南》杂志倾力打造的文学奖项，至今已举办了七届。13年前郁达夫文学奖设立时，就设立了挺高的定位，即“地域性奖项、全国性影响、国际性眼光”，并大胆实行了“实名投票，评语公开”的评奖方式。经过上级部门和各方力量的共同推进，该奖项茁壮成长，影响也越来越大。“关于评奖，看看江南”，这是一家重要媒体给予的赞誉，相当激励我们。毫无疑问，办奖的成功对刊物的发展很有帮助，不仅提升了声誉名头，还能吸纳优质稿子，推高刊物的品质。十多年来，因为郁达夫《江南》杂志经常出现在全国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我们杂志与作者的联通渠道大为拓展，获奖作家和其他名家的稿子频繁抵达我们编辑的手中。同时，我们也顺势跟台湾、香港地区，以及北美、东南亚的文学组织与实力作者进行联络，扩大了稿件提供面。说一句好听的，办了郁达夫《江南》气场大了。而且我们相信，郁达夫小说奖对《江南》杂志的助推作用将会是持续的。

作为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江南》每年都会推出一批有质量的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或长篇小说虚构作品)。这些作品关注时代、思考人性、风格各异，能获得读者好评，选刊的转载率也相当高。但从更高站位视之，我们刊发的优秀作品还是不够的，较少形成有声势的作品冲击波。为了改变此不足，我们积极策划，不时推出规模可观的作品专辑，如青年作家作品专辑、海外作家作品专辑、抗疫文学作品特辑等，构建起新的亮点和特色。如去年《江南》第4期的青年作家小说特辑，我们在策划中添入新意，选定17篇短篇小说组成“80后”“90后”“00后”三个创作方阵，同时又特邀5位评论家组成评论方阵。此次集中展示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招引目光，巡回年轻写作者独特的发现能力和蓬勃的艺术表达，从而辨认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今年《江南》第5期，我们将从观察文学流派的角度，展出三个地域作家方阵的小说作品和评论文章，从而在比较中对中国的地域文学进行思考与评析。

《江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常年经营着数个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品格的文化栏目，包括《非常观察》《海外物语》《历史碎影》《作家地理》等。譬如《海外物语》栏目，主要刊登海外作家自述重要亲历的散文。这几年，该栏目推出了一批有价值又有趣的叙事文章。《非常观察》栏目则是以文学界或文化界的某一点现象为话题，邀请相关专家人士予以深度思考和真情发言。2021年，《非常观察》栏目便以“文学革命”话题为核心，连续发力，推出“今天，小说如何革命？”“小说革命，遇到文学不革命的时代？”“小说革命，作家需要自我革命”“中国当下文学需要培养读者”四次专题讨论，二百位作家、评论家和读者直接参与了讨论。此次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界的一个重要焦点，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可能持续产生反响和延展。

当然，一个杂志要在建造特色中求新，就必须认识新时态和新事物。譬如现在，我们不仅要解决优质稿源不足、作品推广需要加力等问题，还要面对ChatGPT快速登场这种新鲜事儿。ChatGPT 出来之后，对我们文学期刊的逼迫和挑战应该是很大的。几乎可以预见，在5年或者10年之内，文学写作的相当部分会被替代，不会被替代的自然那些特别有创造力的作品。作为《江南》杂志，我们在许多时候刊发的不是最好作家的最好作品，而可能只是70分、80分的作品，这就意味着有一批作者也许会被取代掉。同时，也避免不了有些人会利用ChatGPT来进行写作或辅助写作。比如，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题、自己的要求放进去，让ChatGPT进行创作，或者让ChatGPT帮着磨修改。遇到这些投来的稿子，我们怎么去识别？即使识别出来了，目前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可以或不可以采用这些稿子。换句话说，如果它比一般作家创作的作品更有意思，读者也愿意接受，我们该如何选择？现在，我们可能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在思想意识上应该提前介入。面对科技前沿的崭新事物，我们不能轻易避开或绕过，而要跟踪观察与思考，并预想一些对应的措施。

在纯文学声势并不壮大的今天，要办好一份文学刊物是不容易的。我们需要理想，没有理想主义的相伴，杂志就难以扩大格局，也难以培养自己的特色和刊魂。我们需要定力，在一些时候可以摆低身段，与物质们握手言和，但在守卫文学原则时决不妥协。我们需要匠气，热心约稿，细心审稿，耐心与作者一起打磨，让作品出来时鲜亮一些。而在眼下，我们更需要创新，面对新形势时善于更新观念，不断拓展求进，在增强特色的同时，努力保持生长的姿态。

(作者系《江南》杂志主编)

新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

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台办

■新作快评 杜梨散文《香看两不厌》，《北京文学》2023年3期

犹是颐和园里人

□侯磊

《香看两不厌》是作家杜梨一篇长达24000字的、令人回味无穷的散文。“香”指的是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上的佛香阁。在文中，作者把佛香阁叫做香阁，“在我眼里，香阁可爱又敦厚，是神的孩子”。文中能读出作者冬日里穿着大棉服、厚底鞋，站在佛香阁看大殿的情景。颐和园不是作者的参观景点，而是她喜欢的园林古建筑工作单位。在此之前，作者已经因一篇《在颐和园，我为人民服务，人民千姿百态》火遍全网。这一篇所持续的，是她个人风格的体现，且极具共情力。所谓共情力，是作者要知道自己真正爱憎的是什么，并把这种爱憎极致地表达出来，那是所有人共通的情感。

颐和园很大，作者重点在写佛香阁，对同样迷人的四大部洲、西堤、苏州街、石舫、大戏楼等，却都没有提及。因为作者曾在佛香阁看大殿，其笔下始终在写与个人生命阅历相关的地方，即写“我”在其中，而不是“我”在旁观。佛香阁有八面，三层，四重檐，高达40米，建在21米的高台上。往下是排云殿，往上是智慧海。最初那里是大报恩延寿塔，后仿塔建阁，于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英法联军，光绪时在原址上重建。欣

赏佛香阁最好的地方，是春秋荡舟于昆明湖的万顷碧波之上，可远观嵩高维岳，峻极于天；更可看孤鹜齐飞，长天一色；亦能在冬日里，于湖面上滑着冰看落日。古人造高台高阁是为了通神，颐和园与佛香阁在作者笔下，皆是如水般灵动、清冽的文字。

作者此篇看似随意，实则有很强的技巧和文字控制力。全文放得出去，收得回来，但凡发生在颐和园工作岗位上的见闻所感，都暗含着思考人与这座皇家古园的相通之处。在作者笔下，颐和园是活的，因为园中都是活生生的人，如她那些可爱的领导和同事，以及那些不够文明的游客。

每个人到颐和园来工作，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烦恼和应对方式。有的人散淡，有的人温柔，但他们都能扛下事来——管得住肆意妄为的“老干部”和大爷大妈。那古人智慧结晶的古建筑，并不只是在当这场活人大戏的舞台布景，也如人一般参与其中。员工在管理、保护古建筑，古建筑是在滋养着他们。作者会对工作中随时吐槽拉杂儿，如对自己因政策而无法读博的遗憾，如在佛香阁看大殿时的寒冷——在上个世纪，

工作人员要往佛香阁上搬蜂窝煤、搬门票，毕竟这里冬天天西北风吹得正紧，还要为了保护古建而不安取暖设备。也许只是冥冥注定，佛香阁舍不得作者走，相看两不厌，唯有颐和园。她与同事们在忙碌一天之后，可以一起回眸看一会儿旧日的斜阳。

以往读颐和园的文章，喜欢王国维的《颐和园词》：“昆明万寿佳山水，中间宫殿排云起……”“忆昔先皇幸朔方，属车恩幸故难量……”可比肩《琵琶行》与《连昌宫词》，如有清一代之兴亡史，充满了士大夫的慷慨悲歌。而杜梨的散文里，却是一种久违的自如。她写作不较劲，浑然天成。因为她对人、动植物、阳光雨露都充满了孩子般的好奇心。

古籍建筑，皆逸趣横生；神佛雕像，都自带萌色。正如作者在文中的一段话：

我一直觉得，古建上最迷人的部分，不是那些精致的雕绘和五色的油彩，无论是旋子彩画，苏式彩画还是和玺彩画，都不及瓦檐上长出的野草，牌匾后的蝙蝠和筒瓦里的雨燕，后者才是古建活着的、呼吸的部分。我理想中的散文，应该是这样的味道。